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贾伟／著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 民族人口研究

MINGQINGSHIQI HEHUANGDIQU MINZURENKOU YANJIU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 民族人口研究

兰州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
贾伟／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贾伟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7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2864 - 8

I. ①明… II. ①贾… III. ①民族地区—人口—
研究—青海省 IV. ①C92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2925 号

策划编辑: 杨 青

责任编辑: 冯 敏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2.25

定 价: 6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864 - 8 / C · 347(汉 29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河湟”界定与人口生殖的生态基础	(5)
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史料基础	(19)
第二章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数据辨析	(30)
第一节	明代河湟地区人口数据考辨	(30)
第二节	清代河湟地区人口数据辨析	(55)
第三章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考察	(65)
第一节	明清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65)
第二节	回族与撒拉族人口数量	(78)
第三节	土族人口数量蠡测	(89)
第四章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移流	(97)
第一节	明代河湟地区人口迁徙及人口分布格局	(98)
第二节	四次战争与清代移民活动	(112)
第三节	明清时期人口迁徙方式	(128)
第五章	河湟地区人口与农业生产	(137)
第一节	农田垦殖的持续拓展	(138)
第二节	水利设施日益完善	(157)
第三节	番地的开垦	(167)
第四节	河湟牧场的衰退与畜牧业人口的减少	(175)

第六章	河湟地区城镇的发展	(191)
第一节	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类型	(192)
第二节	河湟地区城镇的形制与发展	(200)
第三节	城镇功能由单一向综合性发展	(206)
第四节	城镇发展对河湟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217)
第七章	河湟地区民族贸易与人口和社会	(226)
第一节	民族贸易与河湟地区人口变动	(226)
第二节	民族贸易对河湟社会的强力塑造	(244)
第三节	整合与共享成为河湟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明特征	(253)
第八章	自然灾害与人口发展	(258)
第一节	明清河湟地区自然灾害解析	(258)
第二节	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类型及其对人口的损耗	(264)
第三节	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济	(270)
第九章	以史为鉴: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发展的启示	(291)
第一节	处理好人口发展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291)
第二节	社会稳定与河湟地区人口发展的关联	(304)
第三节	重视科技对人口增殖的积极作用	(308)
第四节	重视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2)
附 录		(320)
参考书目		(342)
后 记		(34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人口是社会生成、活动的自然基础,没有人口,就没有社会;离开人口,无论是社会,还是国民经济,都既无对象,又失去了基础。因此,人口是社会和经济最基本的问题。对此,相当多的学者给予了深刻的论述。“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基本要素……研究社会史,我们必须从人口、家庭、宗族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和细胞入手”,“那么人口的状况对于社会就有着极度重要的关系”。^①“众所周知,人类历史是和最先的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同时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口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讲,人口是社会构成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任何社会的活动都是一定数量的人口社会行为……没有人口,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无从谈起”。^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口数量和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③。这说明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肯定了人口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人口成为社会研究的先决条件,对于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

在古代社会,人口是国家和民族实力的象征,无论是农业还是畜牧业,都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的生产,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不仅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直接因素,还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所

①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②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17页、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以，历朝历代对人口的重视不亚于农业和土地。中央王朝往往把某一地区的人口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但是，人口的再生产活动很脆弱，易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环境等多方面的干扰，难以保持一种稳定持续的发展。纵观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史，中国的人口发展一直处于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等，这些条件使得中国人口发展处在一种非常优越的环境之中，新中国的人口发展突飞猛进，人口数量剧增。

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许多社会问题都与人口发展相关。所以，现代社会在为人口发展提供优越条件的同时，也对人口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由最初重视人口数量上的增加，转变为重视人口质量的提升。

区域人口研究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人口学的基本共性，又有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影响下的独特个性。区域人口研究的展开，无论是古代人口研究还是现代人口研究，都可以为宏观的人口研究提供微观的见证和典型的个案，既丰富了人口研究的内涵，又使得人口研究能够因地制宜，避免出现“一刀切”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模式，从而避免了宏观人口研究在区域人口研究中面临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因此，推动区域人口研究，能使人口研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避免陷入理论空谈，有力地推动区域社会研究的发展。

河湟地区在西北民族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属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交合地带，总体呈向西凸出之势，深入藏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这里，西向直达藏区，北向穿越扁都口与河西走廊相连，南向可通往四川以及康区，东向与汉文化中心区域相通，史称“右通海藏，左引甘凉”，是“唐蕃古道”的孔塞，内地联系西藏的“海藏通衢”“西藏总隘”，也是“丝绸南路”的要冲之地。《河湟赋》中说：“维雍州之西陲，壮矣哉，得地势之形胜。”^①《读史方輿纪要》也云：“州控扼番戎，山川盘郁，自昔西陲多衅，盖枹罕尝为战地。”^②可见，河湟地区是古代西北交通要津。历史也在河湟这个大舞台上演了无数雄壮的剧目，有些历史事件甚至左右着西北地区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该地区为

①（明）吴祯纂修，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101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②（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

历代中央王朝所重视，成为经营少数民族地区的前沿阵地。

河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河湟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交界、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部，具有两大高原的一些共同的特性，地理构造复杂。在此，操持各种生计方式的各个民族都能找到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小环境。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在两岸冲积出了肥沃的河谷地带，宽延平坦，河水中流，灌溉便利，自然条件较为优越，适合农耕。因此，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可以在河流的两岸垦殖耕种，桑田阡陌；河谷四周山地草场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①。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结构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交汇格局。如前所述，河湟地区是古代交通枢纽，许多著名古道都穿越本境，“优越的交通条件为有经商传统的民族穿梭于农牧之间提供了可能。总之，河湟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构造为各民族提供了适合的生存环境，为河湟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客观基础，使得各民族文化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仍能在这块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②。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客观基础和氛围，使河湟地区成为众多文化汇聚的枢纽。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历史上历经多元族群文化打造的河湟民族走廊所形成的包容性文化品质和边缘性的政治文化地带（帝国的边缘）宽容地收留了所有的背井离乡的族群，他们在这里重组、生根，造就了今天的多元族群与文化的河湟民族走廊文化区”^③；“河湟地区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中国五大民族中的四个民族，加之河湟地区土生土长的特有民族东乡、撒拉、保安、土族，从而形成了今日河湟文化的基本格局。这种八个民族、七种语言、四大宗教或学说同时汇聚一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④。童思正先生曾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太阳辐射、气温、雨量、土壤、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等自然景观与生态的相似性方面，论证了我国从东北到西南存在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转折正在河湟一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

① 贾伟、李臣玲等：《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② 贾伟、李臣玲等：《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③ 杨文炯：《“二龙戏珠”的文化象征——河湟民族走廊多元文化整合的隐喻》，见《“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61页，2011。

④ 武沐、王希隆：《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载《兰州大学学报》，2001（6）。

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①。河湟地区“边界地带正好处于我国三个文化圈——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圈、青藏高原的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圈的交集重叠地带”^②，复杂多样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造就了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之可能。河湟地区在种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在民族文化多元鼎立、兼容并蓄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具有独特气质的文化区域。

河湟地区重要的区域位置，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气质，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对其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本书着重研究在河湟多民族社会建构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人口。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河湟民族人口的发展既有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河湟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严酷，地理构造比较特殊，孕育了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并由此导致自然灾害频率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民族人口发展对自然灾害的承受力较弱的特质，因此，河湟民族人口的再生产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的状态。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今河湟地区人口现状与历史传承和积淀有密切关系，所以，通过对河湟地区历史人口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可以为当今河湟地区民族人口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考察明初以来河湟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梗概，借古喻今，为当代西北民族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历史性的思考。

另外，由于受到历史上“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传统史学对社会生活的轻视，中国历史学对社会微观研究关注不够，把生活史——这一重要的历史内容排挤出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传统历史给人以“骨”感。这种研究方式和倾向也给民族史研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本研究不仅仅探讨民族人口数量、人口迁徙等人口学问题，更是希望通过人口研究，系统地展开人的社会关系研究等相关问题，探析河湟社会内部发展脉络，补充河湟区域历史研究的内容，“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尽可能描绘出明清时期河湟人口的社会生活面貌。

① 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与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② 杨文炯：《“二龙戏珠”的文化象征——河湟民族走廊多元文化整合的隐喻》，见《“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60页，2011。

第二节 “河湟”界定与人口生殖的生态基础

一、研究时空界定

任何区域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要立足于一定的时间段，更要依托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否则研究工作会陷入一种散漫无际、无所借力的状态，正如张利民所指出，“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因此，科学地规范和界定区域的空间是最基本的问题”^①，因此，时空界定是研究工作展开的先决条件。

（一）河湟渊源及其空间范畴

“河湟”这一名词源远流长，最早出现在《汉书》中，该书记有赵充国就如何经略河湟诸羌而作的一篇奏议，其中有一句：“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到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举，五也。”^②《后汉书·西羌传》中也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③的记载。这时的河湟仅是黄河和湟水的简称而已，并不具有区域地理的专指概念。以后，以河湟为内容的边塞诗屡见不鲜，如杜牧就写过几首与河湟相关的诗，还曾在一首诗的题头写道：“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④他另一首诗的名字就直接以《河湟》命名：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① 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载《学术月刊》，2006（3）。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④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三十四《艺文志》，1016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杜甫也有诗云“每惜河湟弃”^①。此处所云的河湟当是郡名合称之意。

《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此处河湟的内涵中又有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称之意。唐代的司空图曾有一首诗写道：“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诗中的河湟也有此意。

宋代也有关于河湟的记载。宋代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②此处所论的河湟已经有一定的专指意义。此后河湟所指渐由地理概念演变为区域特指。

明代以河湟为主体的诗赋很多，并且已经开始将河湟作为一个区域特指，并为后人所沿用。明黄谏曾作《河湟赋》云：“维雍州之西陲，壮矣哉河湟。”河州通判王珣写道：“河湟属三陕极西边陲，乃重地也。”^③明人诗赋中多有吟诵河湟之句。河州有一处镇边楼，平地高起，登楼四望则荡气回肠，不少文人墨客在此激扬文字，吟诗作赋。许槿在《镇边楼（二）》吟道：

河湟春色澹疑秋，三月寒风满郡楼。

羌管一闻折柳曲，始知征辔在边头。

鲍承荫写有《登镇边楼和韵》：

河湟落叶正清秋，玉露萧萧满戍楼。

羌笛数声归路远，梦魂时彻五云头。

可见，“河湟”是由黄河与湟水的并称演进而来，最初是指河、湟两水之间的地区，后来就有了专指的意义。

对于河湟名称的由来以及地理范畴，学术界多有探讨，也有不同的认识。一说认为“河”并非是指黄河，而是指汉代的金城河，其地理范围更为广大，西至青海湖，东至兰州市榆中、皋兰二县，北达祁连山，南至黄河。^④一说认为，“河湟”原指的是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指由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及大通河

①（唐）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见《全唐诗》卷二二四，扬州诗局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②（宋）苏轼：《上神宗皇帝书》（1册），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③（明）吴祯纂修，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147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④ 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8页，北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流域构成的“三河间”地区。其地理范围包括今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等地的沿河区域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① 还有一说认为，“河湟地区即由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构成的‘三河’间地区，在地理上很难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②。更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河湟”之意，认为河湟地区是一个“河湟民族走廊”，就其作为文化区及其边界的意义而言，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西宁、河州、兰州是这一文化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核心地点。^③

学者对河湟地区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虽有不同的认知，但一般都认为，其在地理范畴上主要是指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夏河的河谷地。具体来讲，即东临洮河与定西地区相连，西倚戈尕山、日月山与海南藏族自治州接壤，南面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交接，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在习惯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肃中部西南面和青海东南部，即将大夏河谷地也包括进去。“小河湟”指甘肃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区，特别指的是河湟地区的农业区。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大河湟包括甘肃的临夏州（河州），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循化、化隆，湟水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各县，其中心是河州和西宁。本书以大河湟为研究空间。

（二）研究时间段的界定

河湟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适宜人类繁衍生息，人类在此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河湟地区最早显于史籍的人群是羌人。其后，众多民族活跃在这片热土之上，或友好往来，或锋刃相向。有些民族消亡了，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民族迁走了，又有许多新的民族诞生。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里一直是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是各个政权争夺的要冲之地，战争频仍；这里民族众多，民族关系盘根错节，社会安宁度不高。地理环境也较为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口生殖环境较差，人口数量起伏不定，相关数据的记录也是寥寥无几。至明代这种情况有了极大改变，因为明朝将河湟地区重新纳入王朝版图以来，延至清代，在近六百年

① 丁柏峰：《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6）。

② 段继业：《河湟多元文化的起源、价值与现实》，载《青海社会科学》，2002（5）。

③ 杨文炯：《“二龙戏珠”的文化象征——河湟民族走廊多元文化整合的隐喻》，260～263页，见《“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

的时间内，河湟地区的社会基本稳定，发展延续，不曾中断，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发展总体向上，是多民族社会得到巩固发展的时期，区域文化特质日益鲜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为人口增殖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使得这一阶段成为河湟地区古代历史上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

史料显示，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文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方全史的地方志也开始出现。其中既有全国的一统志，也有省级通志，更有了本区域的志书。这些志书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河湟地区的人文历史，其中有关人口资料的记述也较为丰富，还有相当多的金石谱牒资料被发掘，总之，与人口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前代更为丰厚。这些都为研究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时段界定于明清时期（1368—1912年）。

二、河湟地区生态环境概述

生态环境是人口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人口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来看，人口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都离不开环境提供的物质基础。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还是有限的，仍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自我发展。从文化角度来看，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总是分布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同的特性，它们的烙印深镌于文化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区域人口的人文形态、文化性格、历史传统，熔铸出不同品格的文化系统，进而影响着本区域人口的人文品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产生很大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② 地理环境不同，大自然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这种存在着很大差别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生产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风俗习惯。可见，不同区域人口的每一种文化的产生乃至所衍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出的文化模式，都与这种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空间密切相关。

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当地别具特色的多民族人口演进历史及社会文化，各民族人口和社会文化发展也循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变化。这一切都立足于河湟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在地理学上讲，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表层。具体来讲，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地、河流、湖泊、山脉、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地表的组成物质和形态不同以及水、热条件不同，地理环境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三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它们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互相重叠、互相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三维复合整体系统。地理环境存在于人类诞生之前，这时的自然环境是纯粹意义上的，在人类诞生之后，完全纯粹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并逐渐形成了区别于自然环境（但同时又立足于自然环境）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到了近现代，自然环境、经济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更为密切，更加难以区分开来。

河湟地区的地理区间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和大夏河谷地。河湟谷地是指湟水谷地与龙羊峡以下的黄河谷地，分属流经青海东部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夹于达坂山和拉脊山之间，两谷地连为一体，合称河湟谷地，处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域，海拔是西南高、东北低，呈倾斜状态。地表覆盖有厚度从几十厘米到260多米不等的黄土，集中在海拔1700~2400米，与黄土高原相连接，并在自然特征上有相似性。

湟水谷地只占据湟水流域的一部分，海拔1650~2600米，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自湟源、多巴一带到甘青分界处，长约170公里，又被称之为“三百里湟川”。此为中新世山间断陷盆地。谷地沉积有质地疏松的第三纪红层，其上覆盖有第四纪黄土，其中浅山和高阶地为风成黄土，低阶

地为次生冲积黄土。湟水谷地两侧的山地为青海的多雨中心，支流均分布在干流两侧，形成典型的羽状水系；干支流的交汇处，被拓展成河谷冲积平原。由于湟水对不同岩层的侵蚀作用，使河谷宽度差别悬殊，以致形成了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状形式，自西向东依次为扎马隆峡、西宁盆地、小峡、平安盆地、大峡、乐都盆地、老鸦峡、民和盆地。盆地多呈宽谷形，长10~30公里，宽度在1.5~4公里，阶地发育完整，达5~7级，多为城镇和农耕区；峡谷长1~5公里，宽50~100米不等，至多不过500米。岩层多为紫色砂岩、砂页岩、泥灰岩、花岗岩等，峡谷两岸绝壁陡立，河水迂回曲折，谷窄而深。西宁至民和间的小峡、大峡和老鸦峡，是湟水中下游较著名的三个峡谷，自古以来为交通要道。

黄河谷地是由黄河流水作用形成的谷地，西起龙羊峡东端，东至甘青交界处的寺沟峡，长160公里，依次为龙羊峡、贵德盆地、李家峡、尖扎盆地、公伯峡、循化盆地、积石峡、官亭盆地、寺沟峡。峡谷一般长10~15公里，宽仅百余米，甚至数十米。黄河谷地的盆地长大都为15~30公里，宽2~4公里，其中以贵德盆地面积为最大。盆地水流较缓，在干支流交汇处形成冲积平原，为川水农耕区。底部海拔为1800~2400米，同黄河上游其他河段一样，谷地宽窄不一，峡谷与盆地交替。

黄河冲出积石峡，就进入了黄河上游另一个较大的盆地——临夏盆地，它是由黄河的另一个一级支流——大夏河冲积而成，盆地内山谷多，平地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由西南向东北递降，呈倾斜盆地状态，平均海拔2000米。从区域位置来看，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东临洮河与定西地区相望，西倚巍峨雄壮的积石山与青海省毗邻，南靠奇峻翠秀的太子山与甘南州搭界，北濒湟水与兰州市接壤。临夏盆地内共有大山163座，大中沟8150条，大川16道，大源5处。西南部有积石山、王台山、雷积山里加山、太子山、白石山、莲花山等，东北部有马衔山、巴米山、雾宿山。境内河流纵横，有大中小河30条。临夏州的土壤主要由黄土母质发育而成，有高山寒漠土、草毡土、黑毡土、山地棕壤、黑土、垆土、黄绵土、冲积土和红土等9个土类，是一个土地肥沃、水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河湟谷地大部分年均气温在0℃以上，湟水谷地年均均为3℃~8℃，黄河谷地为6℃~8℃；7月平均温度大都在10℃~18℃，1月份除海拔3500米以上低于-10℃外，其余各地也只有-8℃~-5℃；临夏盆地年平均气温6.3℃，最高气温32.5℃，最低气温-27.8℃。河湟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河湟地区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处于我国东南季风最西部迎风坡的位置,年降水量300~600毫米,少数地形部位可达500~700毫米,且降水量的58%~65%以上集中在作物生长期。这种雨热同期状况是河湟地区成为主要农业区的先决条件。

河湟谷地自然植被以湿性草原为主,土壤为湿性草原土。由于地势高差大,植被—土壤垂直带谱十分显著。海拔1700~2500米为以克氏针茅等组成的荒漠草原,2400~2700米为干草原栗钙土,2700~3400米以寒温性针叶林为主,3400米以上的高山带是以蒿草为主的高寒草甸,牧场长势良好。因河谷地带宜耕宜牧,遂成为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

三、河湟地区的人文环境

人口不仅是一个生物聚合意义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凝结,它的发展不能脱离所处的人文环境。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发展状况是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当今的人口问题是明清时期人口问题发展的延续。故追溯该地区多民族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可以为研究明清时期人口问题提供背景材料,进而全面认识和掌握河湟地区人口的特质以及发展脉络,深刻认识与理解河湟地区人口形成发展的内核。

秦以前,河湟地区被视为化外之地。商代到周秦时,这里被称为“西戎氏羌地”,一直是羌人及其羌文化的生存区域。羌人过着以畜牧为业、穹庐为居的游牧生活。西汉时期,河湟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羌文化一枝独秀的格局被打破,大月氏、汉族、匈奴别部卢水胡等民族相继来到这里。在秦和西汉初期,月氏人分布和活动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①西汉文帝初,匈奴破之,据有其地,月氏主体远徙西域,余众南迁祁连山一带,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称“湟中月氏胡”,两汉人称其“胡,皆以其容貌深目多须之故”^②。由于小月氏与羌为邻,与羌人“杂处,共婚姻”,这种状态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其社会文化深受羌文化影响,他们的服饰、饮食和语言已“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③,渐被湟中诸羌和汉民族所融合、同化。匈奴别部卢水胡也在此活动,并留下了历史遗迹。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钮,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字,由此推定当时在大通河地区活动的是匈奴别部卢水胡人,别部即是臣服匈奴之部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② 黄文弼:《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3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族，并非是匈奴本部。不过，据其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看，当时的匈奴人已经逐渐汉化了。无独有偶，曹魏时期又有一支称为屠各的匈奴别部来到了湟水流域，并遗留了一枚铜印为证。如此种种遗迹可证，匈奴别部确曾在这里活动过，也在河湟地区留下了文化印痕。两汉时期是河湟地区多民族社会的发轫阶段。

汉族移入河湟地区是与中央王朝开疆拓土同步的。首先是秦国兴起，置陇西郡，驱逐活动在临夏一带的罕羌侯部落，据其地，置枹罕县。西汉时，仍设枹罕，属于陇西郡。汉武帝开河西，进一步扩大疆土，全面掌控了河湟地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奉命征讨河湟地区的羌人，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境）、西平亭，临夏属于陇西郡枹罕县。又创置护羌校尉（秩比二千石，校尉营初设于令居塞），持节统领今甘肃、青海东部地区羌人政务，宜农的河湟地区被纳入版图，羌人被迫西迁，“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①。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郡各析二县置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西），枹罕县改属金城郡，强化了对新辟疆土的管理。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再次进军河湟，平定羌乱，先后设置临羌（治今湟源或湟中县境）、允吾（治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境湟水南岸一带）、破羌（治今乐都县境）、安夷（治今平安县平安镇）、河关（治今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5县。同年，金城郡治自甘肃金城西移至允吾，辖县包括青海境新建5县，金城郡所辖县扩至13县，属凉州（辖8郡，金城郡为其中之一）；并设金城属国，安置被降服的羌人。东汉一仍前制，置金城郡，复设护羌校尉，护治西羌，这一制度延至南北朝时。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为加强对湟水流域的控制，析金城郡置西平郡（治西都县，今西宁市），领西都、破羌、临羌、安夷4县。东汉末，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枹罕人宋建建立割据政权，自称“河首平汉王”，立国号，置百官。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遣夏侯渊讨平，屠枹罕城。对于新拓疆土，汉廷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汉族通过或移民，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等多种途径迁入河湟地区，定居繁衍。在中央王朝强有力的支持下，汉族成为了河湟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左衽披发”的羌人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了封建化了的中原文化（汉文化）与土著的羌文化并立的格局。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有相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